

風雨年華

黃秋耘



125/119

风 雨 年 华

黄 秋 耘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风 雨 年 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0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3}{4}$ 插页 4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0019·3548

定价 0.88 元

写在前面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接触过的某些人物和我所直接参与过的或者耳闻目睹的某些事件记录下来。我所记录的范围主要限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一段时间。在这之前，我还是一个不满十七岁的孩子。我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末一年，我不曾认识过它。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年，我只有三岁。省港大罢工那一年，我只有七岁。北伐战争那一年，我只有八岁。广州起义那一年，我只有九岁。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如过眼云烟一样，都不曾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什么印象。在我的坎坷而早熟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过童年，童年的往事也没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至于在这之后（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事件，将来我总有机会把它们记录下来的，目前还不必急于抒诸纸笔。我需要有充裕的时间考虑得更周到一些。

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他的长篇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一段诗一般的话：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在

我们前面万物俱全，在我们前面一无所有；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拿狄更司这段话来概括我所经历过的时代，特别是前面所说的四十年，我想，倒是非常恰当的。我们经历过真正“到处莺歌燕舞”的年代，我们也经历过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浩劫；我们分享过胜利的欢欣，我们也经受过揪心的痛楚。我们看到过美好生活的极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所看到的战地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忘我的献身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情操，都深深感动了我。我想，倘若人世间真有所谓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话，这一切就是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顶峰。同时我们也看到过邪恶生活的极致——且不说出现在沦陷区和国统区那些饿殍载道、民不聊生的叫人毛骨悚然的图景，就是在十年浩劫期间，坐“喷气式飞机”的，挂黑牌的，剃阴阳头的，戴高帽子的，嘴里叼着破鞋的，脖子套上绳子让自行车拉着跑的，被打瘸了腿的，被打掉了牙齿的……这一切不明明都是触目惊心的惨象么？本来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兽性已经完全取代了人性的位置了。

尼采说，人比猴子还要猴子。就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这无疑是厌世主义者的呓语，猴子没有电脑，没有人造卫星，没有航天技术，它们没有到过月球上面去。不过，话又

得说回来，猴子之间没有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没有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没有无缘无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没有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谁也没有看到过一群猴子逼着另一群猴子去挖坑活埋自己。究竟人是否比猴子更理智一些、更文明一些、更善良一些呢？似乎还不好下结论。有时候，在某些人的身上，兽性是远远超过人性的。

在这部回忆录中，我要记下美好生活的极致，又要记下邪恶生活的极致，当然，我也要记下一些搀杂着美好和邪恶的东西。我是什么都不能忘记的，无论是爱还是恨。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摆脱这个负担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法国大百科全书学派有一句名言：“欲语唯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应当服膺这句名言。在我写下来的文字中，我不敢保证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真实，但至少要尽可能保持司马迁写《史记》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尊者”、“贤者”和“亲者”，也包括对自己，都应当不例外。

我们的时代是十分复杂的，总的来说，也是十分伟大的。我不想用灰色来抹黑它，但是我也不想用玫瑰色来粉饰它，还是保留它的本来面目为好。我不想向任何人的身上泼污水，但是我也不想给任何人的头顶罩上神圣的光圈……

当然，“欲语唯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的回忆录也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假话不说，真话说尽”，一种是“假话不说，真话有选择地说”。我想采取后一种写法。这样对于我来说，也许会比较容易一些。

看来，要准确地描述出这四十年“风雨年华”的全貌，很不容易。困难不在于事实本身，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比较重大的事件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中，终身都不会忘却。困难的是，过去的感情已经消失。在过去我曾经认为是神圣的某些事物，今天却觉得荒唐可笑。消逝了的往事可以回忆起来，消逝了的感情是永远捕捉不回来的。

我也知道，写回忆录并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不错，有些回忆使人鼓舞和振奋，有些回忆使人得到信心和勇气，但还有另一种效果完全相反的回忆，使人痛苦不堪。有人说，时间会治好一切，使痛苦减轻以至消失。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伤口终归会愈合的，但突然又会爆裂开来，产生剧痛。写回忆录，是很容易会把已经愈合的伤口撕裂开来的。一切的一切，大概直到死亡才能终结。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一 一二九呵，我的起点	1
-------------------	---

二 到民间去	10
--------------	----

三 内部斗争	15
--------------	----

四 秘密使节	26
--------------	----

五 回到北平	33
--------------	----

六 芦沟桥事变前后	38
-----------------	----

七 从南京到武汉	50
----------------	----

八 “银弹”的秘密	57
-----------------	----

九 奋战南疆	64
--------------	----

十 大风书店和西营监狱	75
-------------------	----

十一 “青知之夜，是何等光亮！”	86
------------------------	----

十二 太平洋的暴风雨	92
------------------	----

十三 我所认识的乔冠华	102
-------------------	-----

十四 记“七战区编委会”	105
--------------------	-----

十五 身在曹营	112
---------------	-----

十六 东纵北撤前夕	117
-----------------	-----

十七	我走上了文学道路.....	125
十八	一个情报参谋的手记.....	132
十九	进城以后.....	140
二十	三反五反运动一瞥.....	147
二十一	“榕城”春秋.....	153

一 一二九呵，我的起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香港一间爱尔兰人创办的中学校毕业以后，一共考上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五间大学。我的父亲是香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他当然希望我克绍箕裘，继承世代相传的祖业（我的祖父黄藻云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医生），进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我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这两间大学的奖学金，并不需要家里花多少钱。但，由于受到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和的熏陶，我从小就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爱书本子，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特别是爱读中国古典诗词，只愿能够考进北平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指导、栽培之下，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即使当不上作家，至少也可以在大学或中学里做个胜任的国文教师，度过这一生，也许会比做医生更为惬意一些。加以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怒潮对我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其远托异国，身居海外，钻进实验室和书堆里，无宁跑到抗日前线的北平，投身进学生救亡运动的激流中，更为符合我的心愿和理想。我的父亲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对子女一向采取比较自由放任的态

度，尊重他们自己的抉择，我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放弃了香港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奖学金（这当然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孑然一身跑到北平，挑选了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以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假如当时我作了另一种抉择，进了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也许将会成为一名内科专家，再不会靠摇笔杆子来谋一碗饭吃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即使我选择了医学，后来又改行从事文学，也并不见得没有可能。许多作家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契诃夫、鲁迅、郭沫若……我当然不敢和这些大师们相比，但这至少足以说明在医学和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人学”，只不过前者是从生理方面来研究，后者是从心灵方面来研究。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人类灵魂的研究者和剖析者，即使不一定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我终于来到北平。秋天的北平是格外妩媚动人的。西风吹红了香山的枫叶，秋阳映亮了北海的涟漪。清华大学的校址就在圆明园废墟附近，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很容易诱发人们“思古之幽情”。然而，对于我这个刚刚从岭南来到北国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风光文物，丝毫也引动不起诗情画意。北平城外已经强敌压境，兵临城下，战云密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谁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了。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和香山、西山，我也没有去玩过一次。同学们朝夕议论不休的，是时局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和战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不由得不感到

切肤之痛。

在我来到北平之前，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经相继发生了。长城以北中国的最后一块领土——热河，已经合并到日本人卵翼下的“满洲国”里去，察哈尔也沦陷了一部分。那一年六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跟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出卖整个华北的“何梅协定”。根据“何梅协定”的条款，日本军方逐步促使华北“特殊化”，日本驻屯军和汉奸武装，不断制造各种事故，到处挑衅。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日军的唆使和支持下，自封为“正义自治军”司令的汉奸白坚武纠集了一百五十多名土匪流氓，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夺去一列装甲火车，开往北平永定门，炮轰北平南部市区。日军在“军事演习”中，曾经一度占领北平东面的香河和三河等县城。国民党的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的武装部队经常到北平朝阳门、东直门和东北郊一带窜扰，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①的紧张局势。带着太阳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常在北平上空低飞盘旋。北平市民每隔几天就听到日军在城外演习实弹射击的枪炮声震天价响。日军的坦克车甚至闯进北平市区，在东城区碾死了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学生。

北平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中国领土，但实际上已经象一只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很快就要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① 古代的渔阳就在今天北京东北边蓟县一带。

北平，这个亚洲最壮丽的、最具有古香古色的都城，岌岌可危，更难消几番风雨！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是出自蒋南翔同志手笔的名言，道出了当时北平成千上万爱国学生的心声。当然，少数亲国民党的右派学生并不这样看，他们坚信蒋介石制订的“先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还会长时间推行下去，“剿共”战争一天没有结束，中日之间就不会发生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那怕北平处于日本华北驻屯军重兵包围之中，也还可以照样歌舞昇平，偏安三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直到他们毕业或者出国留学以后，局势都不会有多大变化。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政府里达官贵人的公子哥儿，他们有点象那些结果在帐幕上的燕子，居危而不思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依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每个周末都在东城的六国饭店里酗酒跳舞，寻欢作乐，通宵达旦。

一九三五年最后的一个月，严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到十二月初，就风雪交加，滴水成冰了。日本人又找寻新的借口，导演了一次流产的政变。有一天，日本浪人和汉奸带领着五六百个流氓和抽大烟、吸白面的“瘾君子”，去中南海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向何应钦代理委员长请愿，沿途叫喊着“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华北自治”等汉奸口号，一直闯进居仁堂。身为华北最高军事当局的何应钦竟然亲自接见他们，待若贵宾，对他们的要求一一给予圆满答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同意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冀

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由老牌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出来主持。这么一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兵不血刃，就实现华北“特殊化”，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不想多费笔墨来记述“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经过，这已经有十多二十部历史著作、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详细地记载过和描述过了。我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得很详细、很清楚的事情。我所要告诉读者的，是作为亲自参加过这两次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一员，从我的眼中所看到的和心中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年满十七岁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而且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发生在祖国大陆的一切事情，对于我来说，都好象《天方夜谭》般那么新奇和不可理解。但有一点我是一清二楚地看到了的，亡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虽然天真而幼稚，却忧心忡忡，有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

“一二九”运动最初是作为一次“请愿行动”发起的，原来预定北平各大学（包括一部分中学）的学生于十二月九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向何应钦和黄郛请愿，主要口号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在地下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周密的考虑和酝酿的，因为只有通过“请愿”的形式，才能把左右两派以至中间派的学生团结起来，倘若一开始就举行示威游行，右派和中间派学生很可能会拒绝参加，

他们认为，示威游行是反对政府的过激行动。但不知怎的，我一听到“请愿”二字就有点反感。我虽然年幼无知，却预感到向何应钦、黄郛请愿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我知道，在爱国的青年学生和赧颜事敌的高级将领和大官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也不可能有什么求得一致的余地。我记得鲁迅先生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说过这样的话：“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又说：“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向段祺瑞请愿使不得，难道向何应钦、黄郛请愿就使得么？他们还不是一丘之貉！何况，众所周知，“何梅协定”是何应钦亲手签定的，向何应钦请愿要求取消“何梅协定”，岂不是等于“与虎谋皮”？请愿，为什么要请愿？为什么要向何应钦、黄郛这样的家伙请愿？我虽然对“请愿”极其反感，但毕竟还是参加了“一二九”那一次行动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然而，“一二九”那一天的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请愿”的目的。西城一带的几个城门——西直门、西便门、阜城门全都关闭了。城外清华、燕京、北平农学院等大学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城。城内的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重重封锁，有五千多人集中在新华门前。新华门紧闭着，何应钦、黄郛都拒绝接见，只派了一名小官员出来敷衍一下。指挥部见请愿不成，就率领队伍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不是长官的接见，而是消防队的水龙、保安队的大刀和警察的皮带、枪把。那一天的天气特别

寒冷，马路两旁的枯树在北风中颤抖，推水的独轮车吊着一串串冰琉璃，冷水喷在学生们衣服上，很快就结成一层硬壳。有些勇敢的同学奋不顾身，把水龙抢到手中，向军警喷射过去，直射得他们抱头鼠窜。军警也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殴打学生，就连中学生当中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也同样被乱打乱踢，形成一场混战，大街上血迹斑斑，伤者遍地。可是，这次不成功的请愿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广大群众，包括大部分思想保守甚至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的大学生都从事实中受到教育：向卖国政府请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展开坚决的斗争。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严酷的现实证明了我的想法完全正确，请愿是毫无用处的事。但是我当时又怎能想到，那一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光辉的日子，值得我们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还要追记它呢。

紧接着“一二九”一周后爆发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是一场更为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群众斗争，城外的学生冲开了西便门进了城，和城内的学生汇合起来。一道由三万多人组成的铁流穿越过北平城的主要街道，队伍中爆发出多年来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心底而从来没有机会喊出来的慷慨激昂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武装保卫华北！

打倒汉奸卖国贼！

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

收复东北失地！

.....

学生们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使北平市民深深受到感动,有些平时胆小怕事的小店主也跑出来迎着队伍鼓掌,许多卖油条大饼的摊贩都自发地拿出食物来慰问冒着凛冽严寒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

时间毕竟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只有当时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那几个场面直到现在还能偶然闪现出来:黄敬攀上电车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陆瑾在宣武门前爬进了城门下不到两尺高的洞口,想从里面为大队打开城门,让大家冲进去;埃德加·斯诺跟着队伍采访和拍照;前门外警察向天空放射排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宣武门外街道居民给我们准备好了大饼和热开水,一个好心肠的老大娘把煮熟的、滚烫的鸡蛋硬塞进我的手心……这一切都好象一张张褪了色的照片似的,唤起我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遗憾的是,世界上还没有发明那么一种显影液,能够把人们脑海中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不大明晰的印象重新显现出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这两个光辉的日子是不可能不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痕迹而轻易消逝了的。严格地说,我的生活从那个年代才真正开始。这么说,我的生活还不算开始得太晚,从十七岁起,我就走上坎坷不平的、充满了暴风骤雨、惊涛骇浪的人生旅程,开始认真思考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真谛,并且初步树立起后来主宰了我一生的信念。

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